

## 紀念梅貽琦

### ——以出版文章做為紀念行動的社會學考察\*

陳瑞樺\*\*

梅貽琦先生(1889-1962)是兩岸清華大學的老校長，也是著名的教育家。由於梅貽琦先生於1989年百歲冥誕，繼而清華大學於2011年慶祝創校百年，這些紀念時機不免促成緬懷追憶的紀念書寫乃至學術研究論文的出版，本文的寫作正是在清華大學（新竹）於2012年舉辦「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週年紀念研討會」的脈絡下發生。然而除了追憶先賢故人之外，對於梅貽琦先生行誼及思想的探究，是否也具有為當代社會提供現實參照的意義呢？

如果對梅貽琦先生教育理念及行誼的書寫構成了一種紀念形式，那麼本文所要做的，便是考察這種紀念形式的不同表現。這項考察的主要對象並不是梅先生在過往歷史中的論述及實踐，而是當代對於梅先生教育理念及實踐的再現。筆者將考察海峽兩岸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分析這些文章關注哪些課題，以理解梅貽琦的教育思想對於當代所具有的現實參照意義，進而探問大學精神的變與不變，以此來紀念梅貽琦這位教育家。

以下討論共分六節，第一節提出紀念行動的分析概念以做為後續考察的理論架構；第二節說明中國大陸梅貽琦研究的興起過程及數量變化；第三節就中國大陸梅貽琦研究課題的數量分布進行分析；第四節說明各項研究課題之所以被提出的脈絡；第五節考察臺灣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之出版狀況；最後第六節從梅貽琦的教育理念來探討何謂大學精神，進而探問在當前的高等教育發展狀況下研究梅貽琦教育理念及行誼所具有的意義。

---

\*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讓筆者得以就文章初稿的問題提出修正及澄清。謝謝研究助理鍾寧協助蒐集整理資料。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 一、紀念行動的社會學考察

### (一) 紀念與回顧點

「紀念」(commemoration)是維繫人類社會的一項安排，透過共同追憶某人或某事，這個社會週期性地確立了模範、分享了喜悅、撫慰了傷痛、重申了警惕，也表達了祈願和想望。有些紀念行動每年舉行，有些紀念行動則是以一週年、三週年、五週年、十週年、二十週年、三十週年、四十週年、五十週年、六十週年、……百年等這種有序變化的頻率在舉行。這種在人類的自然生命及社會生活的基礎上所形成的紀念時間節點，我們稱之為「回顧點」(retrospective point)。

按照紀念者與被紀念人事的關係，回顧點會以不同的時序間隔來延展。以人而言，如果一位被紀念者在離世時已經六十歲，那麼同輩故舊的紀念大約從週年到十週年，後輩延展到二十～三十週年，同時代人則延展到四十～六十週年，超過六十週年則進入歷史時間，這意味著紀念者與被紀念人物之間已經脫離基於生活及生命經驗產生的聯繫，而進入歷史意義的探討。這是因為六十週年是曾經親歷過某項人事的最後一批社會成員仍然在世，還能夠以自身的在場來提供某種歷史見證的最後回顧點。下一個十年的回顧點，除了少數例外，已經是對於自己未曾經歷事件的歷史回顧。

紀念週期反映了社會關係。在紀念者與紀念對象之間越是曾經有直接面對面的社會互動，紀念越傾向以每年週期循環的方式來進行，並且這種紀念不必然具有公眾的形式；越是由於機構組織淵源關係所舉行的紀念，越傾向於依循逐漸拉長時序的回顧點來舉行紀念，且這種紀念必然表現為公眾的儀式。

### (二) 紀念的歷史性及當代性

紀念行動不只有社會關係所帶來的時間週期差異，同時也有著紀念行動意義指向的性質差異。歷史表述及紀念行動所反映的，不只是特定人物或事件所發生時代的歷史性，並且也反映了行動者所處社會脈絡的當代性。紀念行動的性質差異，其中一個重要面向就表現在歷史性(historicity)或當代性

(contemporaneity)的不同偏重上。

就紀念行動與社會現實的關係而言，當所要紀念的人事越是成為已經實現的社會事實，紀念就越趨向於單純的追憶，其意義在於將對人事的紀念或感懷，轉化為凝聚社群的動力。相對而言，如果所要紀念的人事是這個社會仍然繼續面對的問題，那麼紀念行動就具有與當下社會狀態相對照的作用，由此形成對於社會現實的說明、解釋與批判。

以新竹清華大學師生到校內梅園悼念梅貽琦校長的「祭梅」活動為例，我們可以區分出四種不同的「祭梅」類型。第一種是在回顧點時舉行的祭梅，例如2012年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校方在紀念研討會第一天議程結束前，安排了到梅園參訪祭拜梅貽琦，這項活動的參加者除了新竹清華大學行政主管外，也包括從中國大陸前來參加紀念研討會的來賓。第二種祭梅是在與梅貽琦校長或清華大學有淵源的人物到訪時發生，通常是由主任秘書的特別助理陪同去獻花。這兩種祭梅的不同處在於，舉行第一種祭梅的根本因素是配合回顧點舉行的紀念，即便沒有來賓，祭梅仍然會舉行；舉行第二種祭梅的原因是有歷史淵源的來賓到訪，與是否對應於時間回顧點無關。在回顧點時祭梅，其意義為**職責的傳承**，儀式的作用首先是凝聚校方行政團隊；在校外有歷史淵源的人物到訪時祭梅，其意義為**故舊的團聚**，儀式的作用在於讓清華與來訪者重新確立共同的連帶關係。這兩種類型的祭梅，都是由校方行政單位做為儀式的擔綱者。

第三種是由學生團體與校方共同舉行的祭梅，例如在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兩校已成傳統的梅竹賽開打前夕，負責組織賽事的學生組織「梅竹賽學生工作會」都會於梅園舉辦誓師祭梅儀式。由於在面對競賽對手交大時，清華校方與學生乃為一體，而校長是學校的大家長，因此雖然是由學生組織辦理祭梅，但慣例上是由校長率領行政主管先祭拜，此時校長代表的是全校師生。與梅竹賽誓師配套舉行的「祭梅」，其意義為**成員的激勵**，儀式的作用在團結師生與外校競賽以爭取校譽。

在上述三種「祭梅」行動之外，2012年末，清華大學校方因為人社院學

士班學生陳為廷於立法院備詢時面對教育部長的發言態度有失禮貌而在校友服務中心的臉書發出道歉啟事，此舉引起校內許多師生的不滿。學生團體基進筆記社因而發動於12月5日前往梅園「祭梅」做為對學校的抗議及批判。學生團體選擇「祭梅」來發起抗議活動是基於以下理由：「清大校方並未正視大學應當固守的批判態度與社會實踐精神，倉促的在媒體眾口鑠金的不實報導下，向社會輕言『抱歉』，只顧禮貌，不問是非。所以，在這個輕率的道歉中，大學精神死了，那種應當具有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社會實踐的大學精神死了。於是我們在梅園，向梅校長致上最深的歉意。」<sup>1</sup>相較於先前三種類型的祭梅是以凝聚情感為主要的功能，且訴求事項並無爭議，第四種祭梅活動則涉及到學校成員對於爭議事件的不同詮釋。不滿校方處理方式的師生舉行祭梅，其目的在藉由回溯梅貽琦校長主持校務的開明作風，以指陳校方行政單位的作為違背大學應有的精神。在此脈絡下的祭梅，其意義為精神價值的召喚。此時紀念儀式的意義已非清華整體的凝聚，而是清華校內抱持不同價值觀的群體所進行的意義詮釋與道德競爭。

從這四類型祭梅活動的性質，可以推導出不同的參加者。第一種校方行政單位於重要慶典的祭梅，以及第二種校方陪同與梅校長或清華有歷史淵源的故人祭梅，為的是緬懷梅貽琦校長的貢獻，由於在臺建校為已然實現的成就，因此以校方主管及故人為主。第三種在梅竹賽前舉行的祭梅，其目的不只是單純的紀念緬懷，並且在通過儀式達到激勵的效果，因此不只校方行政團隊，梅竹賽學生工作會也參與其中。最後第四種祭梅則是以重新召喚大學精神為訴求的行動，此時祭梅的主要作用並非促成校內的凝聚，而是在面臨價值衝突的重大爭議時，重新詮釋某種精神價值。正因為這場爭議涉及有待捍衛及爭取的重要價值，而不只是機構組織肇建的紀念，因此參與者不限於清大的社群成員，交大關切此事的師生也有人前來。

在四種類型的祭梅活動中，前三種紀念所著眼的是梅貽琦校長的歷史角

---

1 引自發起單位「基進筆記」於2012年12月5日於Facebook上發表的聲明，[http://www.facebook.com/NTHURadical?sk=app\\_121995894561846&filter=3](http://www.facebook.com/NTHURadical?sk=app_121995894561846&filter=3)。

色，而第四種悼念除了著眼於梅校長的歷史角色之外，同時也是因為梅校長對於學術自由、校園民主等與大學精神有關的行誼及主張，能夠為當前事件提供某種借鏡。綜言之，前三種紀念著眼於人物的歷史意義，以及由此產生的社群凝聚作用；第四種紀念則是著眼於梅貽琦對於當代爭議所具有的參照作用。

### （三）出版作為一種紀念行動

紀念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各有不同的意義與價值，但從社會運作與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所關注的是能夠產生社會聯繫作用的紀念行動。個人的緬懷追思，它的意義只留在紀念者和被紀念者兩人之間；一旦將紀念行動放在社群的脈絡下，就必須考量紀念行動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這並不意味著對於紀念行動的考察只需要關注集體的行動者，而是在說明，即便是由個人所進行的紀念行動，我們要關注的也是指向社會的行動。例如發表文章就是一種由個人所進行，但卻指向公眾的紀念行動，它的公共性是透過文章的傳播及閱讀而產生。

就發表文章這種紀念行動而言，被紀念者的行誼事功越是成為已經獲致的社會成果，而不再是當前社會所必須面對及克服的問題，紀念者也就越集中在與被紀念者有淵源的人群中，紀念也就越和社會現實的介入無涉。相對地，若被紀念的人事並非當前已經確保的社會成果，而是仍然必須透過各種社會行動以努力爭取的行動目標，這時紀念的目的在於透過人事的重新表述，來對自身所處社會進行反思與呼籲，並且投入紀念行動的人也不必然與被紀念者有淵源。沒有淵源，是指缺乏生活互動（故舊）、親屬血緣（家系）、或組織延續（組織）等關係，但是要成為被紀念者，必然具有某種社群連帶感。這種社群連帶感，可以擴展到民族、國家，甚至是世界，這時雖然沒有淵源但卻被認為有關連。如果沒有任何連帶感，覺得與己無關，那麼即便某項人事具有重要性，也不會成為被紀念的對象。

然而一項意願要能夠轉為實際的行動，不只要考慮行動者本身的社會條件，並且也牽涉到政治狀況是否容許。值得紀念、想要紀念的人事並不必然

都能以公開的形式表達。如果所欲紀念的人事被政權掌控者視為一種禁忌，紀念活動就只能私下進行，或是在政權管控所不及的地區出現。然而一旦政治控制鬆動，這些以禁忌人事為對象的紀念行動便會漸次出現，先是零星，進而以大規模的方式發生；先是試探，而後明確表達。

從紀念行動的時間向度來看，出版時間和回顧點的重合程度是考察紀念行動所具有社會意涵的指標。越是單純的故人追憶，就越是在「回顧點」時發生；越是具有社會現實參照意義的紀念行動，越容易溢出在「回顧點」之外。追憶的文章在回顧點結束之後便會停止，但具有社會現實參照意義的文章在藉由回顧點的紀念時機出現之後，卻不會因為回顧點已經過去就隨之止息。

綜言之，當所紀念者越是社會發展已經獲得的成果，紀念行動越趨向於歷史性的表述，對被紀念者的行誼或思想的說明，就越表現為對過往人事的緬懷，參與者也就越集中在與被紀念者有淵源的群體中；當所紀念者越是尚待爭取的目標，紀念行動越趨向於當代性的表述，對被紀念者行誼或思想的說明，就越具有借古論今的性質，參與者也隨之擴展到與被紀念者無淵源的社會人群。

說明了紀念行動回顧點的週期表現、對於歷史性與當代性的不同偏重，以及出版做為紀念形式與社會現實的關連性，接下來我們要用這些概念工具來檢視海峽兩岸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出版狀況。我們的探討將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海峽兩岸各自從何時開始出現以梅貽琦為敘事主題或研究對象的文章？出版時間與回顧點是否對應？文章旨趣是在歷史意義上進行人物追憶，還是在當代意義上展開社會反思？

## 二、中國大陸的梅貽琦研究概況

由於梅貽琦在1940年代末的歷史劇變中隨國民政府來臺，因此在中共建政後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名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統治所及範圍內不為人

所述，也因此不被年輕世代所知。根據文勝利的研究，梅貽琦在中國大陸是隨著西南聯大五十週年紀念而重新被提起。

梅貽琦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始於兩本西南聯大校友編輯的回憶錄。一本是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1986年10月編輯出版的《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另一本是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1988年10月編輯出版《笳吹弦誦情彌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這兩本回憶性的資料，使人們得以開始重新認識、瞭解作為教育家的梅貽琦。<sup>2</sup>

如果西南聯大五十週年是讓梅貽琦得以在中國大陸重新被人所認識的紀念回顧點，那麼這方閉鎖歷史的沉箱也不是一下子就整個打開的。事實上，早在1986年的西南聯大紀念專書之前，北京清華大學黃延復教授便已於1981年在一篇介紹美籍教師華敦德(Frank Wattendorf)應聘到清華大學的文章提到「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sup>3</sup>角色是在《清華校友通訊》上撰文介紹華敦德。如此，梅貽琦這個名字在中共建政之後被鎖藏，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從歷史沉箱微微揭開的縫隙中飄出，隨同一位美籍教師一起重新出現在清華大學校史敘事中。

1981年的文章並不只是一次意外，而是傳遞政治徵候的早春新芽。1983年1月，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出版《文化史料》叢刊第4輯，以30頁的篇幅刊登了韓詠華、黃延復、鄭天挺等人所寫的三篇追憶和傳記文章；接著在同年9月，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18輯以49頁的篇幅刊登了韓詠華、吳澤霖、施嘉煬、陳岱孫、張清常、沈剛如等作者的六篇文章。<sup>4</sup>全國政協和北京

---

2 文勝利，〈近三十年來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綜述〉，《煤炭高等教育》第28卷第3期(2010)，頁72-74。

3 黃延復，〈華敦德在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史雜誌》第2期(1981)，頁96-99。

4 《文化史料》叢刊及《文史資料選編》是書籍而非期刊，因此所收錄文章並未計入期刊文章統計數字中。

市政協的文史出版，正式宣告了梅貽琦研究的禁忌就此打開。

最早以梅貽琦為研究對象的期刊論文，是1986年由西南師範大學熊明安教授發表的〈梅貽琦教育思想初探〉。<sup>5</sup>這篇文章廣泛地介紹了梅貽琦的教育思想，包括通識教育、品德教育和體育、大師論、民主治校、發展理工教育、教育救國、學術自由等。這些課題以一種結合了傳記與思想的方式表述，並且是以正面肯定的方式呈現。值得注意的是，為突顯上述教育思想所進行的現實批評，都是鑲嵌在歷史敘事中而表現為一種「過去式的批判」。例如在文章開頭論述通識教育的段落，作者寫道：「他在辦學實踐中，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當局提出的教育方針是『目光短淺』的方針。他主張大學實施『通識為本，專識為末』的教育，……」。<sup>6</sup>這時的梅貽琦，是一位具有歷史性而不具有當代性的教育家。

1987年，黃延復在期刊上發表了〈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sup>7</sup>此外，在《中國現代教育家傳》（第五卷）也收錄了他所撰寫的〈梅貽琦〉專章。<sup>8</sup>1988年，黃延復在《近代史資料》總70號出版了〈梅貽琦日記選〉（1945-46年）。這些史料的整理，提供了對梅貽琦進行歷史研究的基礎材料。

1989年春天，北京清華大學舉行梅貽琦先生誕辰百週年紀念會，由多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介紹了梅先生的思想和事蹟。<sup>9</sup>1989年6月，<sup>10</sup>《天津社會科學》第6期刊出了卞慧新的文章〈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紀念梅貽琦先

5 熊明安，〈梅貽琦教育思想初探〉，《上海高教研究》第4期(1986)，頁104-106。

6 同上引文。

7 黃延復，〈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人物》第1期(1987)，頁50-72。

8 黃延復，〈梅貽琦〉，收入《中國現代教育家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第五卷，頁90-147。

9 會議發言內容由黃延復主編，於1995年出版為《梅貽琦先生紀念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0 我們很難不想到六四，這也說明了當時對民主治校、學術自由等課題的討論是在什麼樣的現實條件下進行的。

生誕辰百週年〉，文中除整體介紹梅貽琦生平，並舉出明通切實的教育思想（通才教育）、科學態度、民主作風等三點作為追懷遺徽最該重視的三點。<sup>11</sup> 1990年《近代史資料》刊登了聞黎明、侯菊坤合著的〈《梅貽琦日記選》書後〉，進一步利用《近代史資料》總70號刊出的《梅貽琦日記選》整理成傳記文章，作者表示：「《梅貽琦日記選》，是40年來我國大陸所發表的第一篇梅貽琦資料」。<sup>12</sup>

1993年，劉述禮、黃延復選編的《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出版；<sup>13</sup> 1994年，黃延復撰寫《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出版，<sup>14</sup>除了說明教育思想，也包含了許多傳記資料在內，這兩本書的出版為研究梅貽琦教育理念提供了方便可及的材料，真正啟動了梅貽琦的研究熱潮。之後從1995年起，幾乎每年都有專以梅貽琦為對象的研究論文出版。更多的是與梅貽琦有關的論文，根據「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的檢索，1995年有5篇，1996年10篇，2001年開始增加到20餘篇，2004年起增加到每年40餘篇，2007年起增加到60餘篇，一直到2011年這股風潮才趨緩（參見表1）。截至2012年8月，中國大陸以梅貽琦為標題的期刊文章共有107篇，若是以梅貽琦為主題來檢索，則相關論文多達539篇。<sup>15</sup>

11 卞慧新，〈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紀念梅貽琦先生誕辰百周年〉，《天津社會科學》第6期(1989)，頁92-94。

12 聞黎明、侯菊坤，〈《梅貽琦日記選》書後〉，《近代史研究》總70號(1990)，頁279-295。

13 劉述禮、黃延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此書列為「中國近代教育論著叢書」中的一冊，同一叢書收錄了十餘位教育家，其中包括梁漱溟、張伯苓、陳獨秀等在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包含了胡適、蔣夢麟等隨國民政府到臺灣的學者。

14 黃延復，《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15 以「梅貽琦」為標題的檢索，會將許多內容與本文主旨直接相關但篇名不包含「梅貽琦」的文章排除在外；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檢索，又會將有些僅僅在背景訊息中提到梅貽琦的文章包含進來。正因為有後面一種狀況，因此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檢索中，最早的三篇(1981, 1984, 1985)其實只提到梅貽琦的名字，而非論述其行誼或思想。

此外，黃延復於1987、1988年發表的文章並未被系統檢索出來，有可能資料庫並未收錄，類似的缺漏狀況必然還有許多未被發現。為了維持檢索所呈現的趨勢變化，表1的數字並未校正。

資料庫檢索的誤差使得文章篇數的統計無法精確，是此項研究的限制所在，但無礙於整體出版趨勢的說明。

表1：中國大陸以梅貽琦為標題及主題的期刊論文出版數目

年度	標題論文篇數	主題論文篇數
1981	0	1
1982	0	0
1983	0	0
1984	0	1
1985	0	1
1986	1	1
1987	0	0
1988	0	2
1989	1	1
1990	1	3
1991	0	0
1992	0	1
1993	0	1
1994	0	3
1995	1	5
1996	2	10
1997	2	9
1998	4	14
1999	0	8
2000	2	13
2001	4	21
2002	8	29
2003	9	27
2004	10	40
2005	9	41
2006	15	47
2007	10	60
2008	7	57
2009	6	61
2010	15	69
2011	0	1
2012	0	12
合計	107	539

由上述說明可知，由於兩岸政治分立所造成的禁忌，梅貽琦的去世並未在中國大陸引發追憶性的文章，一般在週年、三週年、五週年、十週年、二十週年等回顧點所會發生的紀念也沒有出現。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梅貽琦的名字先是隨著對清華校史的研究，做為背景資料被提及；接下來隨著西南聯大五十週年慶這個回顧點的來臨，梅貽琦一方面作為西南聯大校史上的關鍵人物被追憶，另一方面做為一位教育家被研究。1993年《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出版後，研究者得以掌握到較為豐富的材料，梅貽琦研究開始產生擴散效果。從文章內容來看，這些文章中固然有傳記或歷史敘事，但也有許多文章旨在探討梅貽琦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實踐。這些思想與實踐，已經不再只是被當成說明過往歷史的材料，而被當成是一種具有現實參照意義的思想資源。<sup>16</sup>

整體而言，梅貽琦研究在中國大陸從1980年代中期萌芽，到1990年代中期漸次開展，2000年之後蔚然成林，不只是對梅貽琦進行歷史及思想的研究，並且開始以梅貽琦來進行社會研究。對於梅貽琦的歷史研究和思想研究在中國大陸是同時發生的，但歷史／思想研究和社會研究是先後發生的。這些研究一方面是在禁忌解除之後的歷史補課，另一方面也是對現實批判仍然有所顧忌下的對照批評。思想研究為社會研究開路，歷史研究為社會批判掩護。

### 三、中國大陸梅貽琦研究的課題分佈

那麼在中國大陸晚近以梅貽琦為對象所進行的思想探討和歷史研究，試圖導向哪些社會課題？通往什麼樣的社會批判？梅貽琦先生最被稱頌的三項

---

16 例如：馮惠敏，〈梅貽琦通識教育觀及其對當代教育的啟示〉，《黑龍江高教研究》第4期(2003)。田中陽，〈對新聞傳播專業通識教育的思考和探索——兼對梅貽琦先生〈大學一解〉的解讀〉，《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第6期(2010)。吳洪成、甘少杰，〈梅貽琦「從游論」的教育思想與當代啟示〉，《廣州大學學報》第5期(2011)，社會科學版。

教育實踐是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以此做為切入點，應該可以提供我們理解這波梅貽琦研究熱潮的線索。讓我們先考察這些課題呈現的整體動態，接著下一節再說明這些研究所對應的現實課題。

研究論文要能夠反映社會現實的前提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又以言論自由為前提。如果言論自由無法受到保障，講學及撰述也就受到限制，要在這樣的條件下對社會現實提出看法，又要避免因言賈禍，便會出現研究標題（題旨）和研究指向（實旨）的涵蓋範圍不一致的情形。歷史研究做為題旨，可用來為實旨的討論提供可被接受的樣貌；思想探討做為題旨，則是以無爭議的課題來包裹仍然有所疑慮的課題，用可以被當局接受的題旨來掩護尚有疑問的實旨。

題旨和實旨的差距，並不表示文章的標題和內容會名實不符，而在說明那些仍然有所顧慮的課題，會被包裹在沒有顧慮的標題中討論。題旨和實旨並非全然不對應，而是實旨並未在題旨中充分顯現。如果民眾對於某項課題是否可以自由討論還有顧慮，那麼當作者想要探討這項課題，其典型的表現方式並不是具體直接的探討，而更可能是順帶討論。然而即便某項課題只是被順帶討論，卻不因此而不具意義。經常被順帶討論，反而更能說明這項課題佔據了人們的思維，表達了人們的想望。「實旨」的意義，與其說是真實的討論，不如說是真實的想望。

為了呈現題旨與實旨的對應程度，我們採用以「梅貽琦」為主題搜尋到的539篇文章為母體，再以大學精神、教育思想、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為條件進行標題檢索及主題檢索，標題檢索必須在文章標題中出現關鍵詞，主題檢索則只要在內文中出現關鍵詞的討論就可以。標題檢索的結果呈現為表2，主題檢索的結果呈現為表3。

表2：在梅貽琦相關論文中以關鍵字為標題的查詢結果

	通才教育	通識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1986	0	0	0	0

表2：在梅貽琦相關論文中以關鍵字為標題的查詢結果（續）

	通才教育	通識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1989	0	0	0	0
1990	0	0	0	0
1995	0	0	0	0
1996	0	0	0	0
1997	0	0	0	0
1998	0	0	0	0
1999	0	0	0	0
2000	0	0	0	0
2001	1	0	0	0
2002	0	0	0	0
2003	2	2	0	0
2004	1	0	0	1
2005	3	0	0	0
2006	2	2	1	1
2007	2	1	0	1
2008	2	2	0	0
2009	0	0	1	1
2010	1	2	2	1
2011	1	3	3	2
2012	1	0	0	0
合計	16篇	12篇	7篇	7篇

表3：在梅貽琦相關論文中以關鍵字為主題的查詢結果

	通才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1986	0	0	0
1989	0	0	0
1990	0	0	0

表3：在梅貽琦相關論文中以關鍵字為主題的查詢結果（續）

	通才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1995	0	0	0
1996	0	2	1
1997	1	1	2
1998	4	2	1
1999	0	1	2
2000	4	0	3
2001	8	7	8
2002	0	0	0
2003	7	3	8
2004	5	7	12
2005	7	3	4
2006	8	8	7
2007	7	6	8
2008	4	7	5
2009	3	5	6
2010	7	10	12
2011	8	12	10
2012	4	2	2
合計	77篇	76篇	91篇

根據表2的標題檢索，「通才教育／通識教育」共有28篇，<sup>17</sup>「教授治校」及「學術自由」各有7篇，如此看來，「通才教育／通識教育」受關注的程度似乎高於「教授治校」及「學術自由」。但若根據表3的主題檢索，則「學術自由」相關的討論有91篇，高於「通才教育」77篇與「教授治校」76

17 由於標題查詢，「通才教育」與「通識教育」被判讀為不同的條件，因此必須將兩者分別查詢後加總。

篇。為便於比較，以下將表2和表3的查詢結果對照並列為表4。

表4：三項標題檢索和主題檢索篇數對照表

	通才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標題檢索（題旨）	28篇 (66.7%)	7篇 (16.7%)	7篇 (16.7%)
主題檢索（實旨）	77篇 (32%)	76篇 (31%)	91篇 (37%)

從表4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這三項課題中，最受關注的主題是學術自由，但最常被當作標題的是通才教育。兩項數字的差異所反映的是「通才教育」在具有現實對應性的同時不成為禁忌，而對於「學術自由」的討論卻有許多顧慮。

如何能夠討論所關切的重要議題而又能避免因言得禍？變通的方式是採取以下兩種相互關聯的做法。一是因人說事、託古論今，藉由回到梅貽琦的歷史性中來討論學術自由、校園民主等課題，由此對映於當代的社會現實，例如「西南聯大」及「梅貽琦」便是能夠將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課題歷史化來進行討論的標題；二是將學術自由和校園民主包裹在其他的標題中討論，例如「大學精神／大學理念」和「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便是具有含括能力又具有掩護作用的標題。含括能力讓名實之間不致扭曲（而只是包裹），掩護作用則創造了討論敏感課題的可能性。事實上，以「大學精神／大學理念」和「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做為標題的文章篇數也高於「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等三項（見表5）。

表5：五項標題檢索和主題檢索的篇數對照表 (1986-2012.9)

	大學精神 大學理念	教育思想 教育理念	通才教育 通識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標題檢索	32	38	28	7	7
主題檢索	91	113	77	76	91
篇數差距	59	75	49	69	84
附帶比率	65%	66%	64%	91%	92%

數字的意義是在比較中呈現的，表5第三列的數字是標題檢索所得篇數與主題檢索所得篇數兩項數字的差距，也就是該課題被附帶討論的次數。「附帶討論」是指某項課題雖然並非文章標題宣稱要探討的主題，卻仍然被作者認為應該一提。第四列「附帶比率」是將標題檢索與主題檢索的篇數差距除以主題檢索篇數得到的比率，它顯示某項課題牽動意識的程度。如果「學術自由」及「教授治校」被附帶討論的機會最大，即便只是順帶一提，仍然表示這項課題牽動學術社群心緒的程度最高。

必須說明的是，表4和表5的總體數字代表的是從1980年代到目前的整體狀況，在標題檢索和主題檢索之間的名實距離，是中國大陸不同世代學者在現實條件限制下所做的努力，並且在總體數字背後有著與時俱移的動態變化。以往必須因人說事、託古論今，並不代表今日仍然必須藉由歷史討論來映照當代現實。在前人的努力以及社會條件的變化下，題旨與實旨兩者的距離逐漸縮短，讓今日的學者可以更直接地討論現實課題。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梅貽琦不再只是一位活在歷史中的人物，而能夠在文本中被引入與當代進行對話；梅貽琦的思想撰述可以不再只有歷史性的意義，不再只是用來包裹現實問題討論的歷史外衣，而能夠成為學者用來進行社會批判的思想資源。

#### 四、中國大陸梅貽琦研究的課題內容

在對中國大陸的梅貽琦研究所討論的課題有了整體掌握之後，接下來讓我們考察這些討論所指向的現實意涵。受限於研究規模，這項工作的目的不在完整地說明梅貽琦思想被用來探討當代課題時的整體光譜，而在透過幾篇能清楚呈現出問題點的文章，說明當代中國大陸學者如何透過梅貽琦「教育思想」和「大學理念」來進行社會現實的討論。

##### （一）「通才教育」討論的現實對應

梅貽琦先生的教育主張，主要呈現在1941年發表於《清華學報》的〈大

學一解〉這篇文章裡，其中「通才教育」是放在大學新民之道這個課題下討論的。梅先生認為：

大學有新民之道，則大學生者負新民工作之實際責任者也。……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於新民之效。……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sup>18</sup>

1941年，正值日本侵華期間。梅貽琦先生做為一位以清華庚款而進入現代大學教育體系的知識份子，他不只體證了西方大學教育認識自己、追求真理的精神，同時也承續了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培育新民的教養觀。梅貽琦對於大學教育的認知，不只是一要訓練專業知識與技能，更要能夠培養對社會生活能夠產生促進作用的知識分子。之所以需要通才教育，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正是希望大學所培養的知識分子在設想如何推動社會進步時，能夠站在社會運作的廣闊基礎上來體察，而不只是從專業知識來設想。

四十幾年過去，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中期對於梅貽琦通才教育主張的討論，是以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歷史性批判而被引入的。<sup>19</sup>但隨著整體政治及社會環境的變動，通才教育在2000年以後成為更具有現實針對性的論題被提出。

唐星星、孫振球將梅貽琦的高等教育思想歸納為四點：1. 師資為第一要素；2. 學術自由；3. 通識為本，專識為末；4. 培養與利用人才；由此進一步提出上述思想所對應的現代意義，包括1. 大學之大在大樓而不在大師——教師隊伍問題，2. 學術自由——大學學術創新問題，3. 通才教育——複合型人才培養問題，4. 就業問題——大學工作的重要環節。<sup>20</sup>值得注意的是，通才教

---

18 梅貽琦，〈大學一解〉，《清華學報》第13卷第1期(1941)，頁1-12。另收入劉述禮、黃延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99-109。

19 參見註5。

20 唐星星、孫振球，〈梅貽琦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其現代意義〉，《湖南第一師範學報》第3卷3期(2003)，頁31-33。

育是和人才的培養與利用連繫在一起被提出的，而培養與利用人才所要對應的現實課題則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

何以通才教育和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被連繫在一起討論？張紅梅在〈通才教育：梅貽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文中有如下的闡發：

新中國成立以後，除臺灣地區以外，高校收歸國家主辦，納入計畫經濟的軌道。為培養一批適應計畫經濟的專門緊缺人才，國家進行了院系調整，將一些綜合性大學、多科性大學變成專業性、行業性大學。這些學院力圖培養「專」才，所以在課程設置上，重專業知識、專業基礎課，這些課程佔了85%，但不重視複合知識，公共基礎課僅佔了15%；重視學生在知識上的積累，卻忽視了其實踐能力和人格素養的培養。50年代我國又學習蘇聯進行教學改革，全面推進專業教育，進一步強化了「專」，形成了典型的專業教育體系。到了90年代初期，這種狹而專教育的弊端突出地暴露出來，其表現為一般性的專業人員過剩，而既擁有專業知識，又有寬闊知識面的人才缺乏。專業方向過窄，知識面狹小，造成人才市場對這些畢業生的拒收。<sup>21</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以蘇聯為師，於1952年進行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原有的人文社會學科被整併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成為以理工科為主的專門大學。一直到1970年代，大學的專門化都還沒有成為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世界的運作還處於專門化的時代，對於具有靈活彈性及創造性人才的需求尚未普遍；另一方面在一個以集體主義為主導思想並受到高度監控的社會中，個人是否擁有創造力並不受重視，而創造力正是以自由為前提條件。然而一旦進入劇烈變動的世界互動關係中，需要個人擁有

---

21 張紅梅，〈通才教育：梅貽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河南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第6期(2003)，頁50-52。

多面向的能力和創造力，既有大學專才教育內容偏狹、難以培養出具有綜觀通達能力等等問題便浮現出來。另一方面，專才教育內含的工具理性傾向，使得社會生活被排除在大學教育的考慮之外，甚至在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關的科系中，知識也被當成技術來學習，使得學生被培養成只具有專業能力的單面向人，而非整全發展的人。「整個社會長期被金錢至上，專家至上，高速發展等急功近利思想所困擾，這就使『人』的培養大受影響，『機器』的製造卻很流行。」<sup>22</sup>在這樣的教育體系中所培養出的人才，在面對事情時，更可能傾向於考慮如何採取有效的手段以達成目標，卻不關注這些目標和手段對於人、對於生活、對於世界的影響。

## （二）「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討論的現實對應

如果「通才教育」對應的是中國大陸人才培育所面臨的問題及可能的出路，那麼對於「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這兩個項目的討論，所涉及的則是大學發展更為根本的問題。知識層面的狹窄僅只是問題一端，另一端則是創造能力和批判能力的缺乏。不論是創造能力或批判能力，都以學術自由為先決條件，而學術自由又與教授治校（也就是校園民主）息息相關。

為了說明這些課題的內在聯繫，讓我們先回顧梅貽琦先生如何闡述教育的目的，再藉由經濟學者郎咸平對中國大學教育所做的批判，來理解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體制對個人人格產生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

在〈大學一解〉這篇文章中，梅貽琦校長主張教育之最大目的是使群己各得其所、進而相位相育。學問之最後目的，在於《大學》一書開章所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的修己功夫，包含了知、情、志三方面；至於新民之效，一方面有賴大學對於社會及民族之責任，另一方面則有賴於自由探討之風氣，也就是學術自由。

時隔六十餘年，出身臺灣但在中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郎咸平

---

22 唐星星、孫振球，同前引文。

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頗為暢銷的著作《郎咸平說：我們的生活為什麼這麼無奈？》，<sup>23</sup>最後一章的標題是〈誰謀殺了中國的大學〉。作者在其中提到：

只有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學，才會有獨立人格的教授，然後才會引導學生學會思辨，並透過思辨這個過程，最後創造出一個獨特的價值觀。……以前我們北大的校長、清華的校長多麼崇高啊。但是現在呢？哪個大學校長會讓學生發自內心地尊重？好像沒有。為什麼？一個大學校長真正偉大之處在於他獨立的人格，他可以為了學術上的自由跟各種權力作鬥爭。現在的大學校長怎麼可能那麼「傻」？所以說，對於現在的大學，即使是北大和清華，誰來當校長都無所謂了，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基本差不多，沒什麼區別。

相對於梅貽琦校長對於「群己關係」和「學術自由」並重的教育主張，郎咸平用來和「學術上的自由」相配套的是「獨特的價值觀」。何以郎咸平對大學教育目標的設想偏重於尋求人才的「獨特性」，而非經營共同生活所必需的公民德行？對於大學教育目的所做的不同設想，必須放在社會脈絡中來理解。對人的獨特價值觀的渴求，在唐星星、孫振球的論文中有相當具有說明性的陳述：

在大學裡，向學生教什麼，怎麼教，何時教，按理說，教師最有發言權，但我國大學的實際情況是統一的學科專業，統一的教學計畫，統一組織編寫的教材，教師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教師和學生都缺乏足夠的學術自由，所以，在大學裡也就少了深邃、有見地的、發人深思、振聾發聵的特別聲音。……大學應當在特定條件下擺脫外界束縛，放棄暫時利益，成為保護人民進行知識探索的自律場所，成為區分善

---

23 郎咸平，《郎咸平說：我們的生活為什麼這麼無奈？》（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184-185。

惡、區別真理和謬誤的偉大仲裁者，成為「社會良心」的代言人。所以，當電臺、報紙對一件事或一種現象進行探討或評價時，總是聽到高至官員、下至平民，上至教授、下至商販，似乎統一了口徑，聲音何其雷同。更欽佩梅先生當時提出學術自由的深邃與勇氣，……。<sup>24</sup>

在上述說明中，社會輿論之所以會眾口一聲，其根源其實早已深埋在大學教育體制之中。如果在大學裡沒有學術自由，那麼希望大學能擺脫束縛來判別真理，成為「社會良心」的代言人，豈非緣木求魚。重要的其實並非與眾不同、特立獨行，而在於要有獨立人格、敢於批判謬誤。然而大學的獨立人格不能依靠少數人的風骨來支撐，而必須在體制層面對於學術自由給予保障。要在體制上保障學術自由，必然會在制度層面要求教授治校。目前中國大陸所實施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種制度造成了大學行政化、官本位化，「一方面表現為政府對高校的過度干預，大學越來越像行政單位而非獨立的教學科研機構，……。另一方面表現為學校內部泛行政管理體制和運行模式，學校內部資源往往由行政權力而非學術權力決定配置。」<sup>25</sup>教授治校問題和學術自由問題兩者實為表裡，學術自由是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的基礎條件，教授治校則是學術自由得以確保的制度安排。

### （三）小結

整體而言，梅貽琦校長在他所處的時代條件下，對「通才教育」有較完整的說明，而對「教授治校」及「學術自由」，主要是以具體作為來實踐，而非以論述來闡發。<sup>26</sup>由於梅貽琦的政治選擇，他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討論中消失，一直要到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的學者才逐漸展開對梅貽

---

24 唐星星、孫振球，同前引文。

25 馮美玲，〈堅守與革新——梅貽琦「教授治校」理念之於現代大學〉，《天津市教科院學報》第3期(2010)，頁43-45。

26 關於教授治校，雖有梅貽琦先生有「王帽」說等零星論述，但主要是在實然層面上說明教授在內的所有同事在校務進展上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而非在應然層面上提出教授治校的原則性主張。

琦教育理念及實踐的重新回顧，進而讓他成為探討現實課題的思想資源。中國大陸對梅貽琦先生教育思想及行誼的討論，不只是一種回顧歷史的紀念，同時還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大學教育乃至對國家／社會關係的想望，希望藉由對大學教育卓有貢獻的歷史人物之追念來進行社會反思。梅貽琦關於通才教育的系統論述，使其主張在中國大陸成為眾多文章援引討論的參照思想；關於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的實踐，則使他成為眾多學者表達心中想望時的典範人物。

## 五、臺灣期刊上的梅貽琦紀念文章

梅貽琦先生1948年12月在國民政府安排下由北平搭機赴南京，繼而在1949年初離開中國大陸，1955年自美來臺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1956年主持清華大學復校，1958年擔任教育部長並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1959年兼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副主席。1961年他因病辭卸教育部長職務，但仍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1962年5月病逝。梅先生的政治選擇，使得他的名字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大陸無人述說。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知識分子因政治選擇而在兩岸遭受不同待遇，梅先生並非特例，而是常態。由此反推，臺灣的刊物上應該會有不少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文章，但實際情況是否如此？相關文章的出版數量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這些文章都討論什麼樣的課題？關注的是梅貽琦教育理念的歷史性還是當代性？

### （一）臺灣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出版狀況

根據臺灣中央圖書館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的檢索，並根據其他資料進行校正，自1962年梅貽琦先生辭世，一直到2012年7月為止，在臺灣共有31篇以梅先生為主題的期刊文章發表（參見表6）。<sup>27</sup>

---

27 系統查詢所得為27篇，其中黃延復1997年發表的〈梅貽琦與蔣南翔一比較教育學示例〉，由於作者為中國大陸學者，且刊登文章的刊物《中國研究》其發行所位於東京新宿區，無

表6：臺灣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出版狀況

年度	篇數	期刊期號	作者	文章標題	回顧點
1962	2	傳記文學1卷1期	劉崇鉉	悼念先師梅月涵先生	去世
			浦薛鳳	梅故校長精神永在	
1963	2	傳記文學2卷5期	王雲五	我最初認識梅月涵先生時的一件小事	逝世週年
			顧獻樑	梅故校長月涵先生追憶	
1965	3	傳記文學6卷5期	葉公超	梅貽琦——一位平實真誠的師友	逝世三週年
			梅貽寶	五月十九念「五哥」	
			黃季陸	酒杯邊的瑣憶——兼記梅貽琦先生飲酒的風度	
1972	1	傳記文學21卷6期	羅香林	回憶梅月涵校長	逝世十週年
1977	1	中外雜誌	周邦道	嚴復·張伯苓·梅貽琦——當代教育先進傳之14	
1980	1	傳記文學36卷1期	柳無忌	張梅兩校長印象記	
1982	2	傳記文學40卷6期	徐賢修	懷念梅校長：月涵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	逝世二十週年
			趙廣颺	協助清華在臺復校瑣憶：為紀念梅校長逝世二十週年作	
1986	1	新聞天地42卷36期	萬子霖	清華原子爐是怎樣造起來的——梅月涵先生的亮節高風	
1988	10	中外雜誌253-262期	葉公超	梅貽琦的穩、剛與慢	
			趙廣颺	梅貽琦傳稿（一）～（九）共9篇	
1989	4	中外雜誌263、265、267、268期	鄒文海	梅貽琦的幽默	百歲冥誕
			趙廣颺	梅貽琦傳稿（十）～（十二）共3篇	

法視為臺灣作者所做或在臺灣文化場域發生的梅貽琦撰述，當然也無法據此反映臺灣社會的學術及文化境況，因此不予採計。此外，阮大仁2008年於《傳記文學》92卷2期發表的〈教育部長梅上張下之經過——兼述蔣中正與陳誠為此事攤牌之秘會〉，文章記述的事件主角是張其昀，梅貽琦被提及只是因為他在張之後擔任教育部長。另一方面，《通識在線》2011年11月「清華大學百週年專題報導」中包含兩篇以梅貽琦校長為主的文章，但只計為一篇。以上一加二減，共為26篇。再加上系統未檢索到的梅貽寶(1965)文章，以及用梅貽琦先生的字「月涵」為標題的文章，共計31篇。

表6：臺灣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出版狀況（續）

年度	篇數	期刊期號	作者	文章標題	回顧點
1990	1	國史館館刊復刊9期	趙廣颺	梅貽琦傳	
2001	1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1卷4期	顧毓琇	梅貽琦年譜	
2011	2	通識在線37期	謝小苓	永遠的清華校長——梅貽琦	清華百年校慶
			蔡文鵬	梅貽琦校長教育思想論略	
合計	31				

說明：1988年葉公超文章及1989年鄒文海文章為趙廣颺所整理之遺著。

從出版時間來看，上表文章出版的時間點大體上對應於回顧點，例如梅先生逝世當年、週年、三週年、十週年、二十週年、百歲冥誕、百歲校慶等，如果把回顧點前後的文章視為準備與延續，那麼在這些回顧點之外出現的討論寥寥可數。<sup>28</sup>

檢視這些文章的內容，會發現幾乎都是行誼追憶及傳記。<sup>29</sup>寫作這些文章的作者若非故舊，便是清華大學教職員，其中曾經擔任梅貽琦校長秘書的趙廣颺先生所著傳稿以及由他所整理的故人追憶文章便佔了16篇。直到2011年臺灣的清華大學舉行百週年校慶時，由謝小苓、蔡文鵬所寫的兩篇文章，才真正介紹了梅貽琦先生的教育思想，但文章著重的仍然是這些論述的歷史脈絡，而非它們在當代社會的參照意義。

綜言之，臺灣期刊上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撰述，大多是在回顧點前後出版

28 在公開對社會大眾發行的刊物之外，清華校友通訊社（新竹）發行的《清華校友通訊》於1962年8月出版的新2期為「追悼梅校長專刊」，收有追悼詩文40餘篇。1963年5月舉行「梅貽琦紀念館」命名典禮時發刊《梅貽琦先生與原子科學》，收錄了蔣夢麟、陳可忠、李書華、吳大猷等人所做的墓碑文、紀念文章及年譜等共五篇。1965年5月清華校友通訊社編印了《梅校長月涵逝世三週年紀念刊》，收錄了陳可忠、葉公超等人所做紀念詩文及啟事共十九篇。

29 只有蔡文鵬2011年發表於《通識在線》第37期的文章〈梅貽琦教育思想論略〉具有學術研討的性質。蔡文鵬在寫作這篇文章時，為清華大學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主任助理。

的紀念文章，其著眼點在紀念師友及先輩，表彰梅先生對於兩岸清華大學乃至教育發展的貢獻。這些文章的旨趣，主要是再現歷史人物的行誼，而非探討其思想，當然就更談不上以其思想做為反思教育課題的資源。

## （二）梅貽琦在臺灣沒有成為學術研究參照資源的原因

不論文章探討的是特定人事發生時代的歷史性，或是對應於當前社會現實的當代性，其實都是作者所處社會狀態的反映。中國大陸梅貽琦研究的興盛反映了高等教育的發展狀況，反過來說，臺灣期刊上除了追憶文章及傳記，幾乎不存在以梅貽琦為主題的研究論文，這種現象也反映了臺灣學術場域的狀況。

何以梅貽琦在臺灣沒有如同在中國大陸那樣受到眾多研究者的關注，並且成為學術研究的思想資源？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四項：梅貽琦教育理念在臺灣的實現狀況、研究材料的便利程度、梅貽琦的歷史角色、臺灣學術圈的心態與習慣。

通識教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等主張，在歷經1980年代以來的奮鬥努力後，於今日臺灣大體上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的「共識」。即便通識教育的實施狀況不盡如人意，教授治校、學術自由也還有需要檢討之處，但這些主張基本上已成為整體社會改革的成果之一。因此，當代臺灣的大學教師以乎並不需要再呼籲應該實行教授治校或保障學術自由，也不需要再主張應該實施通識教育，需要討論的是通識教育要如何才能辦好。<sup>30</sup>本文在「紀念的歷史性與當代性」此一小節中提到，當所紀念的人事越是社會發展的成果，紀念行動越趨向於歷史性的表述，對被紀念者的行誼或思想的說明，就越表現為對過往人事的緬懷，參與者也就越集中在與被紀念者有淵源的群體中；當所紀念的人事越是有待爭取的目標，紀念行動越趨向與當代課題相連結，參與者也更容易擴展到與被紀念者無淵源的社會人群。根據這項分析，既然梅貽琦

---

30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國立大學法人化」的倡議，讓「教授治校」此一課題重新受到關注。

的教育主張在臺灣大體都已實現，自然也就沒有借古喻今的需要。但這是否就是全部的原因呢？

跳離當前的時代脈絡，回到1980年代後期威權體制鬆動、政體轉型乃至1990年代推動教育改革的時期，臺灣社會曾經對於通識教育、教授治校、校園民主等課題展開熱烈的討論，但也從來沒有像今日中國大陸一樣引梅貽琦為思想資源。我們該如何理解此一現象？是否因為在當時梅貽琦的教育理念及行誼並沒有出版成方便閱讀及引用的基礎資料呢？

在中國大陸，1993年劉述禮、黃延復選編的《梅貽琦教育論著選》以及1994年黃延復的專著《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出版，為1995年之後相關研究的蓬勃發展提供了便利的基礎資料，那麼臺灣是否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梅貽琦研究材料，才使得相關研究無法展開？誠然文獻會影響研究的便利性，但這只能解釋某項課題的研究是否能夠「蔚為風潮」，卻不足以說明何以在臺灣連一篇引梅貽琦為思想資源的研究論文都沒有。更何況，趙賡颺於1988和1989年已發表了12篇〈梅貽琦傳稿〉，繼而出版成專書，<sup>31</sup>並成為海峽對岸學者黃延復撰寫《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另一方面，臺灣在解嚴後對於中國大陸學術出版品的引進從來沒有停過，1993年和1994年在海峽對岸出版的專著，在當時要引為研究材料雖非便利，卻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在今日更是全無問題。出版品多寡及出版時間都只能說明一時的狀態，而不足以說明現象持續存在的原因。那麼，之所以對於本土教育思想家產生研究視盲現象的原因究竟何在？

在臺灣眾多教育研究者沒有將梅貽琦這樣一位教育思想家納入參照視野，其關鍵之一在於其歷史角色。梅貽琦讓人稱頌的教育思想及實踐，大部分是在北京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大時期建立或發生。1955年自美來臺後，梅貽琦不只是清華大學的校長，並且是黨國體制下的教育官員及科技官僚。然而1949年之後的臺灣，捍衛學術自由的並非教育及科技官僚，而是隨國民政府

---

31 趙賡颺，《梅貽琦傳稿》（臺北：邦信文化，1989）。

來臺的自由主義者，如與梅貽琦同輩的胡適，以及晚一輩的殷海光。<sup>32</sup>梅貽琦獻身教育而不涉入意識形態鬥爭，他的思想開明而不激進，甚至在儒家的影響下呈現克己復禮的自制。他的教育理念，首先是要培養學生成為人，成為能夠促成國家民族進步的知識分子，而非如何對抗黨國威權的社會領袖。他的歷史角色使他無法成為1980年代後期進步知識分子引用來與黨國體制對抗的思想資源；在1990年代以來本土化及全球化交作的時代大潮中，探討梅貽琦更是顯得格格不入。<sup>33</sup>

然而我們還是要再追問，面對今日的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梅貽琦對於大學教育的理念，真的不能帶來什麼反省嗎？梅貽琦之所以在此前乃至今日的臺灣學術討論中「消失」，並不只是因為他的歷史角色及教育理念與解嚴前後的時代氛圍格格不入，因此無法得到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青睞；也不只是因為他的主張在今日臺灣已經成為社會成果，從而不再具有現實的參照意義；更無法將此種缺席歸因於參考資料的缺乏，因此無從探討了解。筆者認為，這種忽略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戰後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界逐漸養成的依賴性格有關，從而即便是對自身問題的討論、對本土社會的批判，所援引的思想資源，所採用的批判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外來的。問題並不在討論自身所處社會的問題時援引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學說，而在於當我們探討自身所處社會的問題時，也將前人的討論排除在參照對象之外。這裡所要主張的，並非民族思想或本土學說的優越性，而是此前臺灣學術場域中的偏頗性。說到底，真正的知識沒有本土與外來之別，也沒有學院與社會之分。關鍵在於，當探討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以及我們所面對的社會現實時，這些知識是否具有對應性和啟發性，是否能引導我們從根本處來思考問題。

---

32 本段分析，直接引用了匿名審查人的意見，於此謹致謝忱。

33 反之，在中國大陸，一旦思想的控制鬆動，探討梅貽琦的教育理念及實踐轉而成為突破威權統治束縛從而具有進步意義的行動；另一方面，中國近年來高教快速擴張，科研人員規模大幅成長，一項禁忌的解除，意味著一種可供開掘的新研究題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科研人員投入進行相關研究。

## 六、結語：立大學以世界之精神

梅貽琦校長在〈大學一解〉中，引《論語》憲問篇中孔子所言：「古之學者為己」，說明為學是為了修養自己的學問及人格，而非為了做給別人看以獲得聲名。接著梅先生又以孔子答子路問君子，說明「修己」的目的在「安人」與「安百姓」，修己只是始階，其目的在增進眾人與社會的福祉。

梅貽琦先生的成長背景讓他承載了中國古典人文思想和西方現代大學理念，其識見胸襟則讓他能結合個人修養與社會責任這兩個層面來思考教育的意義。梅先生所處世局要求於大學及大學校長的，並非爭取學校於世界排名的提升，而是「研究學術」與「造就人才」。<sup>34</sup>處於烽火動盪的時代，大學必須直接面對歷史與世界，必須著眼於教育的根本意義來辦學。正是回到教育的根本，大學才能成為肩負社會責任、懷抱淑世理想的人才養成機構，由內而外地透顯出面向世界的大學精神。

進入21世紀，世界面臨許多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挑戰，回應挑戰的根本之道在思考如何從事研究及培育人才，以解決當前世界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不幸的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某些機構按自行設定且變動不居的量化指標來為世界各地質性各異的大學排序，從而在大學之間設立了某種競爭關係，許多大學便轉而將彼此的排名競爭視為高等教育的重要挑戰，讓競爭策略取代了教育目的和大學使命，將心思花在爭取世界排名的提升上，甚至形成根據評比指標來推動校務的倒錯狀況。

然而世界大學排名與大學精神之間是否有正向積極的關係呢？世界大學排名是否考慮通才教育的問題？世界大學排名是否考慮教授治校的問題？世界大學排名是否考慮學術自由的問題？其實答案都是否定的。

世界大學排名制度與大學精神相違背的最鮮明的表現，正在於學術自由

---

34 梅貽琦，〈就職演說〉（1931），收入劉述禮、黃延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這麼基本的大學精神不被評比機構所考量。在學術自由受限的情形下，一所大學仍然能夠被評定為世界百大名校，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學校的教研人員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展現了追求真理的大學精神，那麼這個評選制度必然是一個扭曲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大學只能在工具理性的層面上追求虛假的卓越，卻無法讓信念和價值引導我們追尋更為理想的社會生活。此時一所大學越是佔據排名前端，也就意味著工具理性凌駕於價值理性的程度更為徹底，其結果是讓權力擁有者運用科研成果來遂行更加徹底的控制。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日以全球化之名所操作的世界大學排名競爭，讓大學愈發受到外在標準所制約，而非由內在精神所引導，原本大學應該追求修己安人等精神價值，也就只能成為主旋律之外的希聲異調。一位有識見的大學校長、一所真正卓越的大學，必然不能也不會讓自己的學校纏攪在對知識分子的養成沒有幫助、甚且有害的排名思考中。

本文將文章出版看作一種紀念形式，通過考察海峽兩岸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出版狀況，說明了梅貽琦研究在海峽兩岸的現實參照意涵。由此得出，臺灣出版的期刊文章將梅貽琦放回歷史性中，做為歷史人物來紀念，而中國大陸的期刊文章則讓梅貽琦從歷史性中走出來，成為探討當代課題的思想資源。做為歷史人物來紀念，文章隨著回顧點而出現，並隨著故舊離世而逐漸淡去；做為具有現實參照意義的歷史經驗或思想資源，我們所紀念的人事才真正成為我們的學術遺產，隨著時代開展出新的意義。這時，紀念不再只是基於紀念者與被紀念者之間的淵源，「紀念梅貽琦校長」也就轉化為「紀念梅貽琦」。

梅貽琦做為探討教育問題及大學精神的思想資源，其作用正在提醒我們，在面對複雜的世局時，從問題的根本來思考教育與大學精神。

教育的目的何在？曰修己安人。

大學的目的何在？研究學術與造就人才。

謹以此文紀念梅貽琦！

